



1920年代日本學者常盤大定的中國道觀調查

南開大學副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研究員 吳真

一、早期日本學者的中國道教實地調查

以往學界提及早期日本研究者的中國道教實地調查，一般以小柳司氣太（1870—1940）的1931年北京白雲觀調查¹肇端，繼之以1938年五十嵐賢隆（1906—1985）的瀋陽太清宮調查²，1939年吉岡義豐（1916—1979）的華北道觀調查³，以及1942年窪德忠的北京道觀調查⁴。近來筆者在小柳司氣太等諸位前輩從事研究的機構——戰前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即如今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⁵進行訪學研究，發現兩種尚未被關注的戰前道教調查：一是1920年—1923年之間，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常盤大定（1870—1945）的中國道教史蹟調查成果；二是早稻田大學講師福井康順（1898—1991）在結束北京兩年留學生活之後，1933年8月提交給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中國寺觀現狀報告⁶。

常盤大定對於中國道觀的實地調查，年代較早，影響亦殊深遠。從1920年報紙《朝日新聞》的長篇通信、1921年出版的調查報告《古賢の跡へ》⁷、1923年《支那佛教史蹟》⁸，到1925年十冊本的總報告《支那佛教史蹟》⁹，1938年的《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¹⁰、1939年的圖版和解說共24冊的《支那文化史蹟》¹¹，這些總數加起來近50冊的中國文化史蹟報告書，詳細記載了常盤大定所帶領的團隊對於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浙江、江蘇、江西、湖南等地共38個道觀的實地調查。可能是由於常盤大定本人以佛教研究而著名，且對於道觀的描述也夾雜於龐雜的佛教史蹟報告之中，令以往學者較少留意到其中珍貴的1920年代中國道觀的實態報告。甚至連酒井忠夫在1951年日本道教學會《東方宗教》創刊號上發表道教研究的總結性綜述中，也未有提及常盤大定的道觀調查。¹²

1930年，常盤大定結合自己的中國田野調查經驗，寫出了三教關係的專論《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此書的下編專論道教史，涉及「成立道教」（按：制度化宗教）的教理、教團、經典、齋醮等等方面。在論述全真教歷史時，多佐證以山西、山東、河北等地實地調查得來的金石資料。¹³這種結合宗教場所田野經驗、將道教作為

「宗教研究」對象的研究進路，與同時期專攻道教研究的小柳司氣太從傳統漢學之路徑研究「道家」，頗為不同。¹⁴窪德忠先生在1980年代回憶此書與其重大影響時，云：「1934年我考上東京大學，不久有一本書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這本書就是常盤大定博士的大作《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今天回想起來，正是這本書為我奠定了以後的研究方向。後來成為知交的、已故大正大學教授吉岡義豐，當時也是常盤博士指導的學生。直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我是在1934年末有幸拜讀到常盤博士的大作的。後來我打算以書中一章為基礎，撰寫畢業論文。」¹⁵

1939年6月，常盤大定指導的東京大學本科學生吉岡義豐（時已入僧籍）在其推薦下，以研究計劃「道佛二教習合の情況」獲得日本外務省資助，開始北京寺觀的實地調查。¹⁶可以說，吉岡義豐與窪德忠這兩位日本道教研究領袖走上道教學術之路，皆與常盤大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常盤大定足跡遍及中國南北，出版的道觀、道教名山實地調查報告在版本和內容上皆需要細細梳理。限於篇幅，本文粗略介紹常盤大定的北京白雲觀調查報告，以補學界對於戰前日本道教研究史的一些認知。¹⁷

二、兩年三訪北京白雲觀

1907年11月，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開始在文學部哲學科之下設立佛教哲學講座，這是東方宗教首次在日本的大學學科體系之下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當時擔任這個佛教哲學講座專任講師的是文學博士村上專精，翌年（1908），文學博士常盤大定開始接任講座講師，1926年之後，常盤氏昇任講座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¹⁸在長達24年的佛教哲學的教學與研究之中，常盤大定一直將中國佛教作為研究課題，尤其是1918年在東京大學開設中國佛教史的科目之後，他痛感從未踏足中國令其屢屢無法「讀破」原典，遂在大正九年（1920），決定對於文獻所見的中國佛教史——親自踏查。¹⁹

雖然常盤大定的中國之行首先是對中國佛教史進行實地調查，但是他也了解研究中國佛教無法繞行道教的道

理，坦承「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道教。道教稱得上是迷信蠱海的淵叢，雖然在研究上感覺不到多大的興趣，可是其與佛教有著錯綜複雜的因緣，因此我們還是不能將道教置於考慮之外」。²⁰在踏上中土之前，常盤大定著重閱讀了歷史上幾次佛道交流與爭辯事件的文獻，還特地到收藏著明代道藏的宮內省圖書寮，借閱幾冊相關的道藏原典。²¹

1920年10月1日，常盤大定抵達奉天（即今瀋陽），這次中國之行為期103天，行程主要經歷奉天、北京、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杭州。10月2日，抵達奉天的第二天，常盤大定便到市內的延壽寺、全真道觀太清宮遊覽；10月7日到達北京，9日在武內義雄（1886－1966）²²的向導下訪問北京白雲觀，從山西返回北京後，10月19日再訪北京白雲觀。²³1921年8月，常盤大定的第一回中國調查報告《古賢の跡へ》一書收入專論北京白雲觀的〈白雲觀〉、〈全真道教〉兩篇文章，並配有6幅照片、1幅建築格局鳥瞰圖。

1920年10月9日，常盤大定第一次到訪白雲觀正是下午四時多的晚課時間，全觀道士集合於老律堂誦經，常盤氏駐足觀看，並且拍攝了照片「白雲觀老律殿看經後」（圖1）。這是他第一次觀察道教科儀，印象是「道士們所做功課與佛堂所見頗類似」。²⁴



圖2：上海白雲觀藏經閣，左常盤大定，右觀內道長（1921年）

存的兩部《道藏》，分別藏於北京和上海兩家白雲觀，於是1921年第二回中國調查時，一進上海白雲觀便直奔道藏而去。可是他在觀內向遇到的多名道士打聽，皆不知《道藏》是什麼經書，直至找到守衛藏經閣的道士，才知道《道藏》確實珍藏於此，但「若無上海某氏的介紹，不得出示經書」，常盤氏只能在觀外匆匆拍攝照片便離去（圖2）。兩次尋訪道藏真迹皆不遂願，常盤大定甚為遺憾，直言若有機會可以將上海白雲觀蒐藏的「民封」《道藏》與北京白雲觀的「敕封」《道藏》作一比較，定可大大促進道教經典之認知。²⁶

三、道觀實地調查的開路者

對於1920年代的日本學界來說，全真道教是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常盤大定雖略有研究，可是對於全真與正一之區分，仍然不甚了了，因此他從瀋陽太清宮開始，一路踏訪，一路注意道觀的道派問題。就「全真還是正一」的同一個問題，常盤大定分別對瀋陽、北京、上海等地的道士進行類似於問卷式的口頭訪談。寫給《朝日新聞》的通信中，特別提到他在三個不同的道觀、提出相同問題而得到的不同答案：瀋陽太清宮的道士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²⁷北京白雲觀的道士跟他解釋白雲觀屬於全真龍門派，批評「有妻子是正一派」，而龍門派則是「以邱祖為宗師的修禪苦行」；²⁸北京東嶽廟的道士回答則是：「白雲觀屬皇帝管，東嶽廟屬天師管」，「東嶽廟的道士也是不娶



圖1：北京白雲觀老律殿看經後（1920年，常盤大定攝）

1921年10月第二回訪問中國時，常盤大定第三度訪問北京白雲觀。此行主要對老律堂前的兩通碑刻（〈邱長春行業碑〉、〈七真事迹碑〉）製作了拓本，並訪問道士。²⁵

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閱讀《道藏》時，常盤大定對全真教的初步想法之一，是認為全真道教的突出功績乃在「開雕道藏」。因此1920年10月第一次訪問北京白雲觀時，他留心打聽密封的道藏存佚情況，向觀中道士請求登上藏經閣，但被拒絕。後來常盤大定打聽到當時中國僅

妻的」。²⁹由這些迥異的田野調查結果，常盤大定提出對於道教的實地考察必須「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進行公平的綿密的觀察」。³⁰

今天人文科學研究者們在實地調查時所遵循的田野作業方法，比如測繪、觀察宗教場所在村落中的位置、拍照、拓碑、問卷式的訪談等等，在1920—1922年常盤大定的中國寺觀調查時，已經被其團隊所掌握運用了。比如口頭訪談內容，常盤氏製定了幾個對和尚、道士們的常規提問：祖師何人？與某某寺（觀）、某某宗所尊何異？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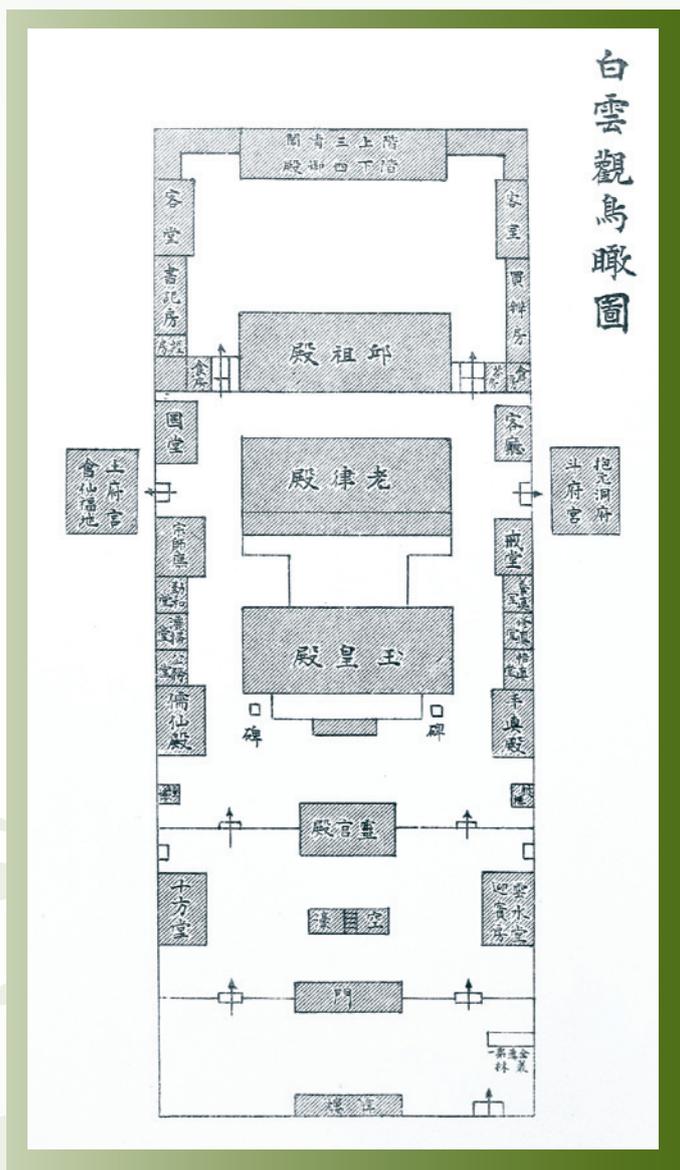


圖3：白雲觀鳥瞰圖（1920年）

禮（科儀）具體程序如何？法系如何繼承？如何營生？雖然常盤氏考察時皆有中國人陪同進行同聲翻譯，但鑒於各地的方言各異，有時這些訪談由常盤氏用筆談的方式直接提問。在佛寺中，這樣的訪談一般問題不大，但是在道觀中，往往由於道士幾不識字而無法展開，又或者是道士們對這些問題基本沒有頭緒，答不出所以然。對此常盤大定多次感到震驚，由此斷言「道士的識字率遠比佛僧低」以

及「道教多數的廟觀只是反映下層階級的迷信」。³¹

由於在道觀訪談的不順暢，常盤大定也開始反思自己的實地調查方式，認為按照當時道士較低下的文化水平，短時間的訪談是不可能獲得全面信息的。1921年第三次訪問白雲觀，得知白雲觀內居住著不少老年長老道士，可惜不允許長時間的停留訪問，常盤大定遂發出心願，若有一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在白雲觀和東嶽廟遊歷，訪問老道士，定能獲益良多。³²吸取常盤氏尋訪道藏與口頭訪談皆不成功的經驗教訓，1931年9月小柳司氣太人還未到白雲觀，先通過日本駐北京文化事業部官員買通方丈陳明霖，此後的調查便一路暢通無阻。³³常盤大定的學生吉岡義豐進入白雲觀這塊「田野」的方法更徹底，類似於今天人類學者常用的「參與觀察法」，他留學北京期間常身著道袍，住在白雲觀中，親自體驗道士生活。³⁴1931年以後日本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興亞院等文化特務機關所進行的中國寺觀調查，均不同程度地繼承和發展了常盤大定1920年代的中國寺觀調查方法。

1920年常盤大定調查中國寺觀之時，在某些學術史的論述中被稱為「首開實地調查中國道教的先河」³⁵的小柳司氣太，尚未到達中國，更未出版那本最早被譯為中文的概論式道家研究《道教概說》（1923年），旅居中國的日本僑民橋樑也尚未寫作介紹「民眾道教」的讀物《道教》³⁶。常盤大定以東京大學講師身份在報章上介紹中國道觀與道教歷史，應該算是普及道教知識的日本先行者。1921年秋天，小柳司氣太緊隨著常盤氏到達中國，在北京逗留九個月，其間也曾參詣白雲觀、東嶽廟，但因「當時尚無道教研究的目的，這些經驗遂成過眼雲煙」。³⁷直到1931年8月小柳氏在日本外務省專項調查資金贊助之下，才開始著手北京白雲觀、東嶽廟的調查研究，而這時距離常盤大定在《朝日新聞》和《古賢の跡へ》等專書中介紹中國道觀的生存實態，已有十年的時光。

應當看到，1920年代的中國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尚無成熟的宗教學研究隊伍，而當時的日本佛教研究已經形成了成型的研究隊伍，提出了較成熟的資料研究方法，他們在佛道論爭、造像、儀禮等方面勢必涉及道教研究，於是便有了1920年代常盤大定的中國寺觀實地調查。幾次的中國田野經驗，令這位享有盛名的佛教研究者略略涉及全真道教史與道觀生態，並在這兩個領域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跡。常盤大定「從佛道關係史帶出來的道教研究」，構成了日本現代道教研究的知識出發點，也影響了吉岡義豐、窪德忠、道端良秀³⁸等一批從佛教轉入道教研究的戰後一代。³⁹

註釋：

1. 小柳司氣太於1931年8月19日—10月5日逗留北京進行調查，此次蒐集的資料後來結集為《白雲觀志：附東嶽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此次調查之始末，見小柳氏1932年12月提交給派遣機構東方文化學院的〈小柳研究員調查報告講演：白雲觀の研究〉，見《東方學報》（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第3號（1932），頁362—372。此報告又以〈白雲觀調查報告〉之名，作為附錄收入1934年該所出版的《白雲觀志》，頁357—388。
2. 五十嵐賢隆於1936—1938年在瀋陽太清宮「常住起居」，其調查報告結集為《道教叢林太清宮志》（奉天：滿洲文化普及會，1938）。
3. 吉岡義豐：《道教的實態》（北京：興亞宗教協會，1941）。吉岡義豐於1939年受外務省資助留學北京，由於某種原因，此調查報告初出版時未具作者名，後被收入《吉岡義豐著作集·別卷》（東京：五月書房，1990），頁1—361。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滿鐵調查部和東亞研究會展開針對中國鄉間民俗與宗教的實地調查，主要強調道教的「民眾宗教」面向，如中野江漢：《通俗道教》（東京：東亞研究會，1934）。可參酒井忠夫：〈日本における道教研究〉，收入《道教的總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7），頁419—423。
4. 窪德忠：〈北京白雲觀の現況について〉，《支那佛教史學》，第7號之第1—3期（1944）。此調查報告後收入窪德忠：《道教と佛教》（東京：第一書房，1998），頁273—302。
5. 1929年，日本外務省以中國庚子賠款的一部分成立東方文化學院，下設東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主要由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者擔任所員。東京研究所的首任主任是著名漢學家服部宇之吉，本文涉及的常盤大定、小柳司氣太、吉岡義豐等日本學者在戰前及戰爭年代，均以東方文化學院研究員的身份獲得外務省資助，展開中國的實地調查。1948年，東方文化院被廢止，東京研究所併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6. 福井康順：《支那寺觀の現に就て》（東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1935年8月印刷）。
7. 常盤大定：《古賢の跡へ》（東京：金尾文淵堂，1921）。此為1920年第一回中國調查的報告。
8. 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東京：金尾文淵堂，1923）。此為1921—22年第二回、第三回中國調查的總報告。
9. 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佛教史蹟》（東京：佛教史蹟研究會，1926—1931）。關野貞是日本著名建築史學家，主要負責寺觀建築的報告與測繪、攝影。
10. 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東京：龍吟社，1938）。另可參見Arthur F. Wright的書評，*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no. 1 (Nov. 1950): 75-79。
11. 常盤大定、關野貞：《支那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館，1939）。此外尚有5冊本《支那佛教史蹟記念集》（東京：佛教史蹟研究會，1927-1931年），3冊本《支那佛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38-1943）等等。Arthur F. Wright發表於*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0, no. 1 (1950): 75-79的書評，對於常盤大定的中國佛教實地調查報告之世界性影響，進行了評述。
12. 酒井忠夫：〈道教研究の動向〉，日本道教學會《東方宗教》第1號（1951），頁88—96。此文也未提及福井康順的《支那寺觀の現に就て》。對於常盤大定的開拓性研究，主要介紹其1930年的《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
13. 常盤大定：〈後編：道佛二教交渉史〉，收入氏著：《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東京：東洋文庫，1930），頁497—750。
14. 比如酒井忠夫：〈道教研究の動向〉第88頁便將常盤大定歸入「從佛道關係立場看待道教」的宗教學者一類，而小柳司氣太則是傳統的漢學立場。小柳氏在1920年代出版的道教相關研究著重道家思想研究，主要有《道教概説》（1923年，此書有192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老莊哲學》（1928年）、《老子新釋》（1929年）。
15. 窪德忠：〈道教研究五十年〉，《中國道教》，第4期（1991），頁40—45之41。
16. 〈吉岡義豐博士略年譜〉，載於《道教研究論集：道教の思想と文化：吉岡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頁6。另參朱越利：〈吉岡義豐與道教研究及中日關係〉，《中國道教》，第3期（1989），頁24—30。
17. 中國學界的日本道教研究學術史研究論述，就筆者眼力所及，唯葛兆光的論文：〈當代日本的中國道教研究〉中的註釋提到過：「常盤大定到中國考察佛教遺跡，順便就把白雲觀、東嶽廟當做考察點，見《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參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第2期（1996），頁86。
18. 《常盤博士還曆記念：佛教論叢》（東京：弘文堂書房，1933年）。
19. 常盤大定：〈緒言〉，《古賢の跡へ》，頁1。
20. 常盤大定：〈續古賢の跡へ〉，《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頁337。
21. 宮內廳所藏《正統道藏》現存4115卷，其中雜有萬曆版抄本補卷。它原為九州的一小藩藩主於江戶時代（1603-1867）後期購進，後獻給江戶幕府，明治維新後歸宮內省（即今宮內廳）收藏。
22. 武內義雄（1886—1966）當時從京都大學畢業後旅居北京，1926年出版《老子原始》（京都：弘文堂書房），以治中國思想史而聞名。武內氏曾撰〈訪古碑記〉詳述他陪同常盤大定在易州、房山等地的實地調查經歷，見《武內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89），第十卷，頁181—218。
23. 常盤大定：〈旅行の範圍及順序〉，《古賢の跡へ》，頁7—20。
24. 常盤大定：〈白雲觀〉，《古賢の跡へ》，頁30。
25. 〈北京白雲觀と京兆居庸關〉，《支那佛教史蹟》，頁141—142。此外還提到立於邱祖殿前的巨碑〈邱長春真人事實〉碑，由於時間關係無法拓本，常盤氏抱憾而去。
26. 〈上海白雲觀〉，《支那佛教史蹟》，頁347。
27. 〈奉天より北京に〉，《古賢の跡へ》，頁27。
28. 〈白雲觀〉，《古賢の跡へ》，頁33。
29. 〈東嶽廟〉，《古賢の跡へ》，頁47—48。常盤氏認為東嶽廟供奉多位夫婦神靈，比白雲觀多了一層「人間味」，這也是東嶽廟道士被批評娶妻生子的原因之一。
30. 〈全真教〉，《古賢の跡へ》，頁42。
31. 同上註。
32. 〈白雲觀〉，《古賢の跡へ》，頁34。
33. 小柳司氣太的〈白雲觀調查報告〉（《白雲觀志》，頁361—362）對此「公關」手段有詳述。另據報告所言，1931年9—10月的一個月之間，小柳氏隔天驅車從東城甘雨胡同的住所趕往白雲觀調查，總共不過16趟左右，而非後來有些日本道教研究文章所敷衍的「1921—1931年小柳司氣太十幾次訪問白雲觀，甚至住進了觀內」。
34. 吉岡義豐：〈白雲觀の體驗〉，收入氏著：《永生への願い》（京都：淡交社，1970），頁217—228。
35. 張澤洪：〈20世紀以來日本的道教研究〉，《四川大學學報》，第2期（2003），頁29—34之29。
36. 橘樸：《道教》（北京：支那風物研究會，1925）。
37. 小柳司氣太：〈白雲觀調查報告〉，《白雲觀志》，頁359。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幾種介紹日本道教學術史的文章，皆將小柳氏1921年的北京之行誤認作是專為白雲觀調查而來，此當係未細看1932年小柳氏本人的調查報告所致。
38. 1939年已經出版《概説支那佛教史》（京都：法藏館）的佛教學者道端良秀於1942年進行山東省全真道教遺跡的實地調查，其報告於戰後出版，即〈山東道教史蹟巡禮〉，《東方宗教》第1號（1951），頁82—87。
39. 酒井忠夫將戰前日本道教研究分為六個方向，第一個即是從中國佛教的立場出發研究佛道關係，常盤大定是此方向的代表者。見〈道教研究の動向〉，頁88—90。

道教文化文憑課程 (2010-2011)

Diploma Programme in Daoist Culture

首屆道教文化文憑課程已於2010年9月10日開始授課。本屆課程共有43位學員報讀，其中22位學員是已修畢或正在修讀道教文化證書課程的學員。在6月25日舉行的諮詢講座上，老學員們已向新學員介紹了自己的學習經驗和體會，相信身處同一課堂上的雙方，將會產生更深入的交流與切磋。

本屆文憑課程共設九個單元，包括了道教概論、道教與中國文化、道教生死觀、道教與養生、道教與中國藝術等五個固有課程，以及香港道教與宮觀歷史、道教經典、道教與術數、導向獨立研習等四個新課程。除獨立導向研習佔24學時之外，其他單元各16學時，共計152學時。學員修畢所有單元並符合評審要求後，可獲本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聯合頒發之「道教文化文憑」。

學員們將由最為熟悉的香港道教與宮觀的歷史開始，一步步深入學習，從道教歷史、道教思想、道教經典、道教與其他中國文化傳統的互動，包括藝術、文學、術數等等不同角度，既能了解到一個存在於經典中的、歷史中的道教，也能接觸到一個在歷史發展中不斷融入普羅大眾生活中，以至今日仍活躍在現實生活中的道教。此外，獨立導向研習課程的設置，可謂是文憑課程的一大特色。此課程將通過介紹專題研習方法和圖書館所藏的道教文獻與研究資料，並在相關任課導師的指導下，共同深究某個課題，旨在培養學員個人的文獻分析能力，為學員今後能夠進行獨立研習，提供一定的幫助和支持。

已確定的課程單元的開課日期及任課導師，請見下表：

日期	單元	任課導師
2010年9-11月	香港道教與宮觀歷史	李家駿先生
2010年11月-2011年1月	道教概論	祝逸雯小姐
2011年1-3月	道教與中國文化	張德貞博士
2011年3-5月	道教生死觀	黎志添教授
2011年3-5月	道教與養生	袁康就博士
2011年5-7月	道教與中國藝術	尹翠琪教授 張澤珣教授
2011年7-9月	道教經典	夏志前先生
2011年7-9月	道教與術數	陸毅先生



廣州道教碑刻考察紀要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梁斯韻

現今，在道藏經典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之上，地方道教研究漸漸成為了道教研究學者的主要興趣之一。近年，明清時期中國地方史志得以陸續大規模地整理出版，道觀碑刻、觀志、山志等資料也逐漸豐富起來，但其中所蘊藏的地方道教資料仍多是零亂、欠系統的，以致散佚的情況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對學者研究地方道教的熱情和成果產生影響。然而，這些資料又是地方道教研究的不可缺少的寶貴財富。作為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重點項目之一——「道教與廣東地方社會研究——廣東道教碑銘彙集」研究計劃，正是為了彌補這一缺憾。

隨著研究計劃的深入，工作團隊已於本年初大致完成了從大量方志文獻中對廣州府道教碑文的蒐集。除卻第一手資料的收集之外，直接的田野考察，以及蒐集宮觀、道士、道眾的口述歷史資料，也具備了同等重要的參考研究價值。故本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博士後研究員李靜博士與研究生梁斯韻小姐，聯同廣州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鍾東教授及其研究生李肖肖先生，於2010年5月21至22日，對廣州部分廟宇進行了考察。是次考察除了增補方志記錄以外的道教碑刻及對已收的碑文進行較對外，亦希望能實地考察收存這些碑刻的地方廟宇，以便親身了解碑文中所展示的廟宇與地方社會發展的關係。

此次考察共參訪了分屬廣州越秀區、天河區、白雲區、黃埔區、蘿崗區的10間地方村廟，搜集了40通明、清時代的碑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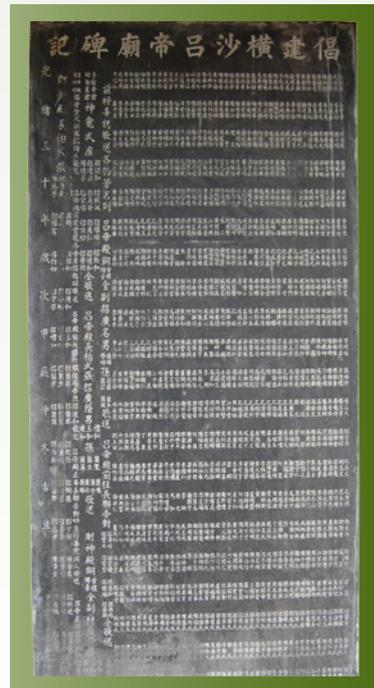


圖2：金沙街呂帝廟：《倡建橫沙呂帝廟碑記》，光緒三十年（1904）

中有33通是未見於方志文獻及《廣州碑刻集》¹一書的。例如，方志及其餘碑刻文獻只記錄了筆崗村玄帝古廟有一明隆武元年（1645）的《鼎建玄帝廟碑記》（見圖1），然是次考察卻發現廟內有歷代重修碑刻十通，雖然因部份碑文已漫漶不清及考察時間緊絀，而未能一一盡錄，但我們仍能增收其中明嘉靖八年（1529）、明隆武元年等數通重要碑文。這表明現存於各地方廟宇中的道教碑刻數量，可能大大超越了方志文獻的記錄。



圖1：筆崗村玄帝古廟：《鼎建玄帝廟碑記》，隆武元年（1645）



圖3：南崗村三清堂

除了碑文數量上的增加外，此次考察還搜集了不少地方志和廟宇資料，例如，越秀區楊箕村的村志、北帝廟管理制度，天河區吉山村的村志等，以資補足碑刻中的相關記載，尤其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廟宇與社區發展的互動關係。

然而，這些蘊存珍貴道教碑刻的地方廟宇在城市發展中多被忽視，在是次考察的廟宇中，有很多已荒廢破落，例如金沙街的呂帝廟（其中仍存的一通碑刻，見圖2）、南崗村的三清堂（見圖3）；另外還有一些廟宇面臨著因廣州城市規劃而將被拆遷的命運，如楊箕村之玉虛宮（見圖4）。

總括而言，是次廣州道教碑刻考察成果豐碩，更顯示了實地考察在「廣東道教碑銘彙集」研究計劃中的不可低估的價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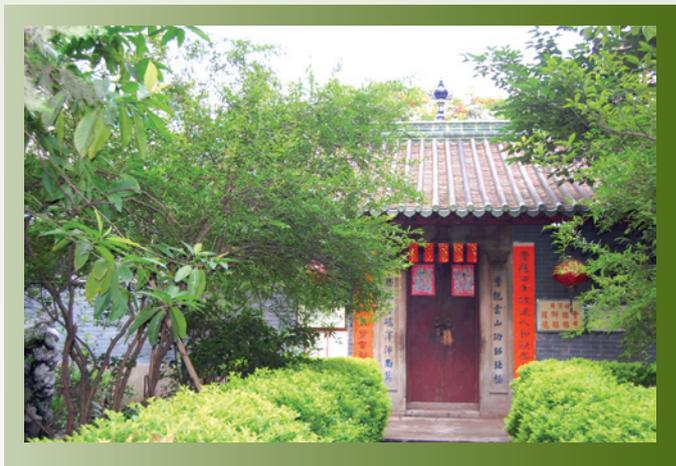


圖4：楊箕村玉虛宮

考察時間	屬區	廟宇	記錄碑文
21/5 上午	越秀區	玉虛宮 (楊箕村)	1. 清康熙六十年《重建玄帝古廟碑記》 2. 乾隆十九年《玉虛宮重修碑記》 3. 嘉慶四年《重修北帝廟碑記》 4. 嘉慶十年《重修兩廟碑記》 5. 道光二十二年《重修玉虛宮碑記》 6. 光緒二十七年《重修玉虛宮碑記》
		晉慶廟 (吉山村)	1. 乾隆五十四年《重修古涌碑》 2. 道光十年《方閣水松涌道碑記》 3. 道光十年《建方閣碑記》 4. 咸豐年間《榮安堂碑記》
	天河區	三元廟 (吉山村)	1. 乾隆三十年欠題碑記 2. 道光二十四年《重建三元古廟碑記》
21/5 下午	白雲區	呂帝廟 (金沙街)	1. 光緒二十四年《橫沙財神廟碑記》 2. 光緒二十七年《倡建橫沙呂帝廟碑記》 3. 光緒三十年《倡建橫沙呂帝廟碑記》 4. 光緒三十二年《倡建橫沙呂帝廟碑記》
		三清堂 (南崗村)	1. 乾隆四年《重修三清古廟碑記》 2. 乾隆四十五年《重修三清古廟碑記》 3. 道光十四年《重修三清堂碑記》
22/5 上午	黃埔區	北帝古廟 (滄頭村)	1. 乾隆乙卯年《簽題建廟工金碑記》 2. 乾隆六十年《重修北帝古廟碑記》 3. 光緒十四年《重修廟簽助工金碑記》
		北帝古廟 (塘口村)	1. 乾隆五十五年《重修北帝古廟碑記》 2. 嘉慶十一年《重修廟碑》 3. 道光十二年《重修北帝古廟碑記》 4. 同治七年《重修北帝古廟碑記》 5. 光緒二十四年《重修北帝廟碑記》
		南海神祠 (茅崗社區)	1. 乾隆十一年《重修南海神祠碑記》 2. 乾隆四十七年《重塑神像碑記》 3. 乾隆五十五年《重塑神像碑》 4. 嘉慶三年《重修南海神祠碑記》 5. 道光四年《重修南海神祠碑記》 6. 同治五年《重修南海神祠碑記》 7. 光緒七年《金爐碑記》
22/5 下午	蘿崗區	洪聖古廟 (筍竹舊村)	1. 嘉慶丁卯《重修南海神廟碑記》 2. 嘉慶元年《重修本鄉洪聖廟碑記》
		玄帝古廟 (筆崗村)	1. 嘉靖八年《蒲蘆園陂圍碑記》 2. 隆武元年《鼎建玄帝廟碑記》 3. 乾隆庚午年《□□玄帝廟碑》 4. 乾隆癸卯年《重修玄帝廟碑記》 5. 道光十二年《番禺縣正堂訊斷繪註蒲蘆園陂圍各圳水道圖形》

1. 洗劍民、陳鴻鈞編，《廣州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該碑刻集蒐集了廣州市現行行政區範圍內的古代、近代碑刻，多達1165多方。包括散見於地方文獻中的前人已記錄的碑記，以及通過實地調查、考古發掘出的新碑記。

第五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



蒞臨畢業典禮的諸位嘉賓，前排左起依次為：洪少陵道長、周和來道長、李宏之道長、張金濤道長、湯偉奇道長、黎志添教授、吳凱文博士、游子安教授、任伯江教授和袁康就博士。

為推動中國道教界培訓領導人才的工作，自2006年始，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至今已有超過百名的學員，可謂碩果累累。2010年7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迎來了第五屆暑期研修班的學員，他們均來自道教傳統豐富而悠久的江西，那裡正是道教正一派祖庭龍虎山嗣漢天師府的所在地。承襲研修班的一貫傳統，學員們在三周內，學習了現代管理學、文物管理、傳意技巧、宗教學理論、宮觀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並輔以相關宮觀的實地考察與經驗交流等活動。

學員們在課堂上認真聽講專業的理論知識，並結合自身所處所遇的實際情況，積極提問，師生之間的互動成為了「教學相長」一詞的最好註腳。此外，與往屆研修班相比，今年考察活動的對象更趨多元化，除了香港明愛等保留的考察地點外，更增加了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佛教寺廟（妙法寺）和民間廟宇（北帝廟）的考察，使得大家對香港的宗教生態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也對各個宗教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有了更為直觀的體會。在所參訪的香港宮觀中，除了著名的全真宮觀、道堂之外，香港的正一道觀——泓澄仙觀也名列其中，天師傳

人在香港的活動與發展，也同樣引起了學員們極大的興趣。由於加入了香港正一派道教打醮儀式——太平清醮的簡介，「香港道教專題介紹」課程的內容也得以更加完備，太平清醮影片的播映以及與新界正一派陳鈞道長的直接交流，使得整個課程頓時生色不少。

2010年7月24日，「第五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暨第三屆道教文化證書課程聯合畢業典禮」於中文大學西部教學大樓內隆重舉行，並誠邀得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金濤道長、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偉奇道長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吳凱文博士作為主禮嘉賓，出席典禮。19位學員分別從主禮嘉賓、各位研修班導師和高道大德手中領受畢業證書，為短暫而忙碌的研修班學習生活劃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眾位學員均於修畢課程後，完成了定題論文，其中15篇論文將於稍後集結成書，予以出版，敬請關注。



第五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師生交流會

第五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學員名單：

陳大青道長、饒羅禹道長、梅羅盛道長、金理清道長、蘆理瓜道長、鄧國富局長、何建平局長、聶金華局長、林傳富局長、吳超先生、高羅行道長、魯羅平道長、曾羅華道長、秦羅偉道長、楊青松道長、謝東曼道長、熊雄道長、黃大璞道長、李靜慈道長和張大霖道長。

暑期研修班成員感想

第五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學習隨筆

江西省道教協會副會長 陳大青道長

學習是每一個人提高自身素質與完善自我品行的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學習過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感悟。用文字的形式記錄下來，才會在總結中真正體會到自我的得失，在得與失中尋求進步與升華，從而點亮智慧人生。

香港蓬瀛仙館為了提高內地道教界的文化及管理水平，加強交流，共同發展，聯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從2006年開始每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為期二十天的「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培養道教人才。

歲次庚寅已是第五屆，這屆的學員全部都是我們江西的道教弟子，可見香港蓬瀛仙館對江西道教的支持，我深知這次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初夏，我懷著無限的崇敬和憧憬之情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校園依山傍海，綠樹成蔭，鳥語花香，整個校區就是一座山，崇基、新亞、逸夫、聯合四大書院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各個山頭。所有的大樓都掩映在綠蔭之中，整個學校沐浴著森林的氣息。

三周的學習參訪豐富精彩，獲益匪淺，感受深刻。其一，親身感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現代教育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香港道教界的仙長們在弘道中無私奉獻的偉大精神，目睹了香港道教界在弘道立德、濟世度人、服務社會等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其二，系統學習了現代管理學理論、文物管理、宗教學理論、口語傳意技巧、文化資源管理、宮觀管理學等課程，豐富了我的理論素養，為今後在宮觀管理工作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夯實了基礎。其三，先後到香港道教聯合會、泓澄仙館、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北帝廟、齋色園、萬德至善社等獨具特色的宮觀參訪交流。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管理理念與弘教方式讓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通過這次學習，香港道教界科學的宮觀管理經驗和先進的弘道理念，必將觸動我對今後道教的發展及道觀管理方面，進行更理性的思考。仙館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乃敬之有餘。



2010年7月5日至24日，江西省道教界共有16位道教弟子及3位相關人士參加了香港蓬瀛仙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聯合舉辦的第五屆道教文化與管理暑期研修班。此次學習讓我感受頗深，通過各位老師的授課，特別是黎志添教授給予我們學習上的點評指導，使我們受益匪淺。我們學習了香港道教的先進理念及其管理模式，使我對香港道教的認識有了更深一層的提高，領悟到內地道教與香港道教一古一今的區別與緊密聯繫，更進一步理解了現代道教文化與管理的真正含義。讓我在學習、生活等各方面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更加堅定了我為道教事業奮鬥終生的信念。



首先學習了「現代管理學」課程，富萍萍教授從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及領導學等幾個方面系統地向我們作出了介紹。富萍萍教授旁徵博引，具體給我們講述了組織行為的管理和協調與領導及人力資源管理的密切關係。讓我們意識到領導階層，必須要明確自身價值觀才可以獲得認同和尊敬。

然後是「溝通傳意學」課程，任伯江教授主要從口語傳意、表達技巧及說話、演講、教學、實踐來講述溝通的重要性。任伯江教授的講課非常生動有趣，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並且輔以大量的圖片及幽默的幻燈片，課堂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學員們踴躍參與發言，彼此產生互動。

再次是「文化資源管理」課程，許焯權教授主要講述的是建築文化管理，香港大部分的道觀廟宇的舊址原物保存完好，每一間都是藝術博物館；還有游子安教授講述的「香港道教」，讓我們瞭解了香港道教的歷史演變。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處於快速發展的香港，還延續著道教的優良文化傳統：贈醫施藥、普利陰陽與祈雨法會、賑災濟貧、慈幼與辦學；夏志前先生講述的「宮觀管理」，明確了道教管理單靠清規戒律來管理是不夠的，還需要與時具進，用現代的管理模式才能符合當代道教的發展。

最後，蓬瀛仙館副理事長馬梓才先生系統地為我們介紹了蓬瀛仙館的行政架構及弘道工作，從蓬瀛仙館的歷史發展、先進的管理模式到弘道揚法，展現了一套既傳承了《道德經》文化，又非常健全的管理體制。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道教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蓬瀛仙館也由簡約的研修修煉場所改為有限公司，整個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實質卻絲毫沒有改變，仍然在為傳承道教文化孜孜不倦，把宗教與慈善教育事業緊密聯繫。其中值得我們內地學習的地方很多，包括理事會、現代辦公、會議機制、檔案制度、文件編號制等等。內地宮觀也要與現代化接軌，相應提升管理水準，應用科學技術，採用硬體及軟體全電腦化辦公形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現代的管理體制體現了道教的「人性化」。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的本質除了來源於天神，還來源於世俗生活。很多人往往不理解道教，不知道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道教徒生活也相應得到提高。如果道教停滯不前，不及時地主動變化，就阻礙了道教的發展，例如：電腦、電話、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在現在的各行各業都已普遍為人所使用，如宮觀排斥它們，就不利於弘道揚法，也不符合「適時而變、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過去宮觀的用水都是靠道徒們挑的，如今，有條件的宮觀都換成了自來水，這樣不僅方便，又節約了人力時間。道教不是一個脫離現實、漠視生活、逃避生活的宗教。反之，她是一個濟世利人、積極入世的宗教，葛洪《神仙傳·張道陵》謂：「陵與弟子入蜀，往鶴鳴山，得正一盟威之道，能治病，百姓奉之為師。……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犯之罪，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很顯然，張道陵天師積極地解除人們的疾苦，並以宗教的方式教化世人去惡從善。這就道出了一個事實：道教從一開始就是以解脫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困難的面貌出現的。在科學日新月異、知識爆炸及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的今天，堅持道教精髓以不變應萬變的同時，道教管理要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道教事業才能源遠流長，經久不衰。

學習期間，舉辦方還組織學員到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蓬瀛仙館、青松觀、道風山、萬德至善社、泓澄仙觀、妙法寺等當地道觀及其他宗教場所進行參訪。還有學習交流研討會，師生共同交流，對自身的提升裨益良多。香港道教宮觀之雄偉、道風之純正、宗教氛圍之濃厚，使我們有很深刻的體會。對於范淑娟老師在生活上對我們的關心照顧，我們也深表感激。在此，我代表來自江西的學員們，對香港蓬瀛仙館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諸位老師、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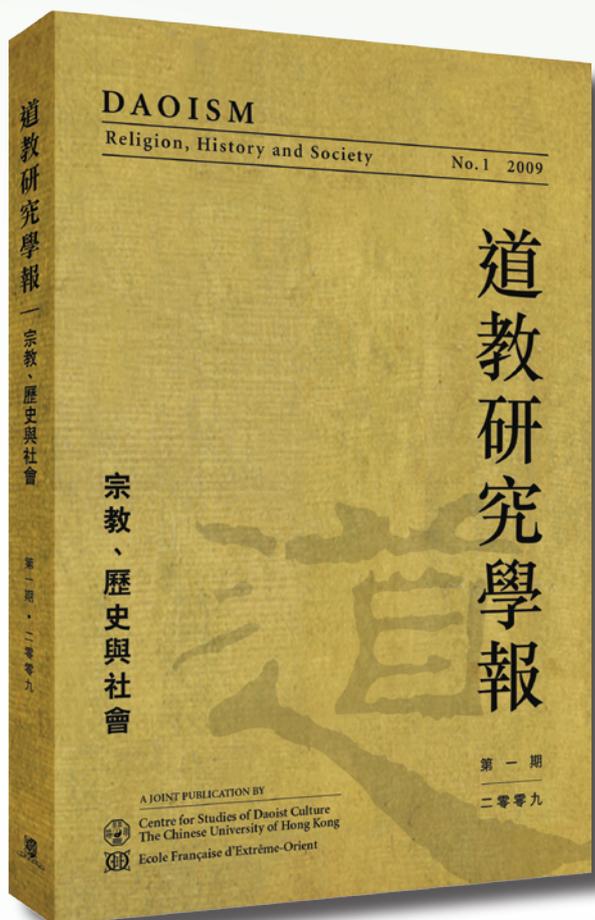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No.2 2010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二期

即將
出版

出
版

The second issue of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will come out in December 2010.

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出版的《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二期將於2010年12月出版。



Articles of the issue No.2 2010 第二期內容預告：

- Early Daoist Ideas on Political Practice: How to Select and Control Government Officials
Barbara Hendrischke 芭芭拉·亨德施克
- Authority and Discipline in the Early Daoist Church
Terry Kleeman 祁泰履
- The Arrival,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Daoism in the Central Hunan Region
James Robson 羅柏松
- Iconizing the Daoist-Buddhist Relationship: Cliff Sculptur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Reign of Tang Xuanzong
Christine Mollier 穆瑞明
- 道教版畫研究：大英圖書館藏《玉樞寶經》四註本之年代及插畫考
尹翠琪 Maggie Chui-ki Wan
- 華北地方社會中的全真道士：以華山法派廣續與公共廟宇經營為中心
吳真 Wu Zhen
- 地方道教之形成：廣東地區扶鸞結社運動之興起與演變(1838-1953)
志賀 市子 Ichiko Shiga

Call for Papers

Please send submissions to: daoist@cuhk.edu.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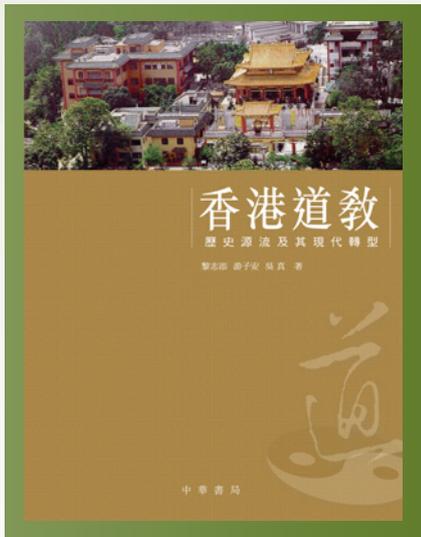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cuhk.edu.hk/crs/dao/index_ch.html

Both printed and online versions are available. Please download subscription form from our website:

除印刷版外，線上版亦同時推出。請於本中心網頁下載訂購表格：

http://www.cuhk.edu.hk/crs/dao/index_ch.html

《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出版



書名：《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
 作者：黎志添、游子安、吳真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4月
 定價：港幣98元

- ◎ 在宗教多元化的香港，喪葬習俗為何普遍道教化？
- ◎ 香港喃嘸先生究竟有哪些「古仔」？
- ◎ 扶乩並不是香港道教宗教實踐的全部？
- ◎ 先天道如何成為道教團體的成員？
- ◎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太平清醮的儀式意義是什麼？
- ◎ 今日香港道堂科儀的演習，緣何以坤道（女弟子）為主？
- ◎ 從道侶清修之所到積極辦學的宗教慈善團體，香港道堂怎樣實現現代轉型？

本書圍繞上述問題，系統梳理香港道教的歷史源流和地方特色，剖析呂祖道堂、正一派喃嘸先生和先天道在港的流播與發展，闡述香港道堂科儀和道教組織的傳承歷史及其對港人的影響。全書共分「呂祖道堂的歷史源流」、「火居的正一派道教」、「先天道道堂的傳統與現在」、「道教科儀」及「道教團體與社會」五個章節。作者以深入淺出的筆法，輔以逾百張珍貴圖片，並附相關註釋、延伸閱讀書目，俾讓愛好道教文化及香港歷史的人士，以致一般讀者均能對道教文化及歷史有更深且全面的認識，實為道教研究者及愛好者的必備圖書。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人事變動

增聘

1. 中心新聘博士後研究員李靜博士參與「廣東道教碑銘彙集」研究及出版工作。
2. 中心新聘研究助理祝逸雯小姐參與《道藏輯要》研究計劃及學術出版工作。

離任

3. 中心副主任游子安教授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離任。

中心管理委員會衷心感謝游教授五年來為中心研究工作所作出之貢獻。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405室
 電郵：daoist@cuhk.edu.hk

電話：(852)31634464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傳真：(852)31634463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

執行編輯：張德貞 祝逸雯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